

企业家甄别、民间金融与金融共生

田霖

(郑州大学 商学院,河南 郑州 540001)

摘要:企业家通过创办企业来实现自我甄别,而民间金融制度不仅仅是一个融资制度,而且是一个甄别企业家精神的社会制度。民间金融与中小企业是一种唇齿相依的共生关系,或曰企业家精神与此金融共生环境密不可分。金融共生环境下的企业家精神和民间金融制度促进了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成长和金融深化。

关键词: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甄别;金融共生;民间金融

中图分类号:F8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5)05-0035-03

Entrepreneur Screening, Nongovernmental Finance and Financial Coexistence

TIAN Lin

(School of Management,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Entrepreneurship can be distinguished by originating a new firm. Nongovernmental finance is not only a financing institution, but also a social institution of entrepreneur screening. There's a close financial coexiste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small-medium-size firms and nongovernmental finance. That is to say, th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and financial coexistence environment are tightly correlated, which push forwar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inance deepening of the south-east region of China.

Key words: entrepreneurial spirit; entrepreneur screening; financial coexistence; nongovernmental finance

一、企业家的定义

有关企业家概念的内涵多种多样:熊彼特所说的企业家是与其创新职能紧密联系的,柯兹纳强调企业家的洞察力,科斯把企业家视为企业内部配置资源的主体和权威,彭罗斯认为企业家是指发挥“企业家服务”作用的人,奈特(Knight)把不确定性与企业家职能联系起来,卡森(Casson)则将企业家定义为专门就稀缺资源的配置做出判断性决策的人。舒尔茨(2001)则认为,企业家在经济从非均衡到均衡过程中发挥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每一个人都是企业家。正如米塞斯所说:所有人类行为都会有企业家要素。企业家涵义的多样性取决于研究者研究的目的和角度不同(梁洪学,2004)。

梁洪学(2004)认为,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不能混同,企业家精神只是企业家效能的外在表现,创新精神、拼搏精神、敬业精神都可称之为企业家精神。Stevenson(1990)提出,企业家精神是一个不管目前控制的资源,由个体追求机会的过程。而汪丁丁(2003)则认为,单独一方面并不能构成完整的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应该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熊彼特所说的“创新精神”,其次是韦伯所说的“敬业精神”,第三是诺斯从新制度经济学里提出来的“合作

精神”。这三者构成了血肉丰满的“企业家精神”。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理解,熊彼特和柯兹纳将两个概念混用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讲,具有汪丁丁所说的血肉丰满的“企业家精神”的人,我们可以将之称为“企业家”。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不同(梁洪学,2004),其中最重要的区别是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经理人一般是企业从市场上选聘的,而企业家往往是开创和打造一个新的企业并且在市场竞争中涌现出来的。

二、民间金融:一种企业家甄别机制

Chen(1998)认为,企业家的功能在于营销、创新、管理、冒险和金融控制,企业家自我甄别的需要提出了创建自己的企业的目标。企业家自我选择(Self-selection)的关键有两方面,一是识别市场机会。Eckhardt(2003)论证了企业家产生过程中机会的作用,指出企业家精神就是发现、评估、探索未来的货物和服务需求,研究、识别市场机会。另一方面,往往也是容易被忽视的方面就是如何实现这种机会,因为真正的企业家要能够迅速地由机会认知转移到开发上去(赵文红,2004)。

李茂生(2004)提出,作为企业家,必须拥有利用和驾驭金融市场的能力。从资本与企业家才能这两

种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看,一个社会的融资制度安排的核心功能在于对企业家的筛选,即把稀缺的资本资源配置给最优秀的企业家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率。因此,企业家的筛选机制与其所面临的融资制度密切相关。因此,一个好的融资制度,必须是一个能够筛选出最优秀的企业家的金融制度,是一个能把稀缺的社会资本资源配置给最有效率的企业家的制度(连建辉,2002)。

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有赖于民营经济的迅速崛起和发展壮大,但是由于“金融抑制”的存在,民营企业往往缺乏启动资金,由于内源融资不足,只好求助于外源融资。但是,对于初创企业而言,由于市场、技术等的不确定性,以稳健性为原则的银行一般不愿意为初创企业提供贷款。同时,由于既没有经营历史,又缺乏盈利记录的公司,不能为一般的投资者提供估价依据,故普通的权益资本投资方式也不适用。企业家的创业行为出现融资困境,金融约束在企业家精神的塑造上起到束缚和桎梏的作用。这方面 Paulson 和 Townsend(2004)进行了深入分析:金融约束大大影响到企业家的活动。他们通过实证研究,认为金融约束在塑造泰国的企业家精神的模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富裕的家庭才更加有可能从事创业活动。Holtz - Eakin et al(1994)和 Evans and Jovanovic(1989)进一步完善和证实了这一假说,他们利用美国的相关数据进行调查研究,认为财富对企业家精神存在重大影响,并得出结论:金融约束在企业家精神的形成过程中至关重要。我国学者张军通过数学推演进一步证明:除非个人的财富足以满足创办企业所需的资本投入 K , 否则,从社会的角度看,一个人(临界)的企业家才能是其个人财富的增函数。可见,企业在初创时期,资金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当自有财富不足,外来融资有限时,即使企业家发现了市场机会,也无法通过创办企业将其与普通的职业经理人区分开来。因此,企业家识别市场机会只是企业家活动的前提,融资机制为企业家的脱颖而出提供了必要条件。Cohen & Levin 的研究表明,当资本市场不完善使独立企业家的经济安全受到威胁时,很少可能采取创建新企业的形式。

浙江省蓬勃的金融创新活力为融资困境的解决提供了有效渠道,这就是民间金融的兴起。民间金融包括了中小金融部门与非正规金融如互助会、民间个人借贷、信贷联盟等。其中,中小金融机构部门的产生、成长有其天然的合理性。彭兴韵(2002)对灰黑色金融、体制外金融与非正规金融概念进行了区分。非正规金融是指民间借贷或股权集资的融资活动,它是针对有组织的金融中介或有组织的发行与交易市场而言的;体制外金融是偏离了政府所规定的行为空间和半径的融资活动;灰黑色金融往往与非法的金融交易相关。非正规金融和体制外金融对资源配置具有明显的帕累托改进的能力,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与灰黑色金融截然不同。中小企业经营机制灵活,在解决就业问题和促进经济发展方

面发挥巨大作用;况且,虽然小企业不能很好地强化比较优势,但是更善于识别、发现新的机会(Ireland, 2003),这一优点是大企业所不具备的,加之我国产业结构的劳动密集型特征,企业家创办的企业往往规模不是很大。因此这就相应地要求中小金融机构为其提供融资服务。这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是一种顺应市场的制度创新。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与个私中小企业的兴起相互联系在一起,个私中小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也必然内在地要求民营中小金融机构的进一步发展(史晋川,2003)。

因此,中小企业与民间金融业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民间金融为企业融资提供方便,充当企业运行的润滑剂,如果没有中小企业的需要,民间金融就失去了存在的主要依据。企业发展需要扩张资本,由于有效市场的缺乏,若民间金融不弥补空缺,企业将会丧失及时发展的机会。因此,中小企业与民间金融是一种唇齿相依的共生关系。或曰企业家精神与此金融共生环境密不可分。共生,不是共生单元之间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吸引和合作;不是自身状态和性质的丧失,而是继承与保留;不是一种相互替代,而是相互补充、相互依赖。以中小企业为主导的这种工业组织结构所嵌入的不是政府的偏好体系,而是民间的传统。民间金融业的存在硬化了企业的信贷约束,使资金的配置效率大大提高了。

单一的银行类民营金融机构也还不能完全满足民营经济的金融需求,因此民间金融包括了更多的非正规金融如私人借贷等形式。这些形式的存在要依赖于当地社会资本的存在。因为共生存在三要素: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共生模式是关键,共生单元是基础,共生环境是重要的外部条件。这种外部条件可以称之为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粘性空间或地理环境。所谓社会资本,存在不同的表述。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社会资本包括隐含的知识(Tacit Knowledge)、网络的集合、声誉的累积以及组织资本,在组织理论语境下,它可以被看作是处理道德风险和动机问题的方法。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则指出:社会资本是关于互动模式的共享知识、理解、规范、规则和期望,个人组成的群体利用这种模式来完成经常性的活动。我们认为它是某地区所特有的,属于某特定区域所独有的小生境。不同区域的社会资本会对不同区域融资体制的选择产生影响,正向环境对金融共生起激励和积极作用,反向环境对金融共生环境起抑制和消极作用,虽然大环境(我国国有银行为主的金融组织结构)抑制了民间金融的发展,属于反向环境,但是,浙江本地的小环境却是正向环境,它包括悠久的地域文化和历史传统、金融意识和金融人格的存在等等(金雪军等,2004)。Drake(2003)认为,某地区的属性(Attribute)是个体创造力的催化剂。良好的社会网络构成有效的激励环境,企业家自激励的有效性取决于当地的社会网络。因此,我们观察到的不仅仅是中小金融机构的存在,还有大量的内生性的非正规金融的出现。

因此,民间金融与东南沿海的一些地区(如浙江省)的社会信任结构是兼容的,这种社会网络结构便于企业家进行创新,同时企业家的作用又嵌入到社会网络结构中。浙江民间金融的发展与壮大满足了企业家的创业资金需求,解决了企业家面临的融资困境,使来自民间的企业家精神得到了鼓励,民间金融的发展和金融机构的多样化,避免了资金的闲置和配置的低效率,为企业家的甄别创造了关键条件。而中西部地区多以国有企业、国有银行为主,又缺乏相应的社会网络,因此企业家的甄别成本高,其金融成长由外生决定,与东部地区内生性金融成长相比,活力显得相对不足。

三、企业家甄别机制的完善

首先,非正规金融在金融发展与自由化进程中极端重要。彭兴韵(2002)从信息不对称、金融脆弱性等角度解释了非正规金融存在的合理性。胡继之(1999)则从中国股票市场的演化过程中分析得出相似观点,即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的金融制度变迁本身就是从非正规金融逐步向正规金融制度演化的过程。因此谈金融制度创新,谈企业家甄别,不该忽视、更不该歧视民间力量。承认民间活动的创造性和合法性也许比一味地完善现有的制度更重要。

其次,要防止金融排外性的出现。金融地理学家 Tickll(2002)提到了金融排外性(Financial Exclusion)这个概念,他指出,洛杉矶中国民族银行的发展确实有一定地位且能被有效利用,但是它的地位是不稳固的,不易复制模仿,并且可能无力克服金融的排外性。因此,单纯依赖社会网络的非正规金融虽然显示了其旺盛的生命力,但是其内在的缺陷是不容忽视的。因此民间非正规金融曾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企业家创办民营中小企业和自身甄别的需要,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在融资关系上以人格化交换为特征的这种金融活动方式是难以适应以契约性关系为特征的现代市场经济的。因此,客观上需要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多种金融机构来提供不同的金融服务。目前创业筹资(Entrepreneurial Finance)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

最后,防范区域金融风险。中观尺度的区域金融风险主要是由于个别或部分机构的微观金融风险在区域内传播、扩散构成,或者其他经济联系密切的区域金融风险向本区域传播、扩散引起的关联性金融风险。由于人们的心理预期和选择上的差异,很可能将风险成倍地放大,造成系统性的危机和损失。浙江温州、台州地区的“倒会”风波曾给社会的稳定造成了不良影响,因此,尊重区域金融自发进化和自然选择的同时,还要积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其扩大为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四、结论

民间金融制度不仅仅是一个融资制度,而且是一个甄别企业家精神的社会制度。它内生于当地的社会网络结构,与民营中小企业共存共荣。有效的民间金融制度和企业家精神造成了东南沿海一些省

份与中西部地区在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上的差异性,但它本身并非没有在缺陷。它与中小企业的共生关系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随着环境的变化和共生单元自身的变化而变化。共生关系不仅存在由松到紧的过程,而且也存在由紧到松的相反过程,比如随着企业做大,融资方式就可能发生相应变化,因此民间金融制度本身也在不断的演化与完善之中。

参考文献:

- [1] ADAM TICKLL. Geography of service: Progress in the geography of services III—Time to move on?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2, 26(6): 791-801.
- [2] ANNA L PAULSON, ROBERT TOWNSEND. Entrepreneurship and financial constraints in Thailand [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04, (10): 229-262.
- [3] GRAHAM DRAKE. This place give me space: Place and creativity i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J]. Geoforum, 2002, (34): 511-524.
- [4] CHAO C, CHEN ET AL.. Does entrepreneurial self- efficacy distinguish entrepreneur from managers?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998, (13): 295-316.
- [5] DAVID J DENIS. Entrepreneurial finance: An overview of the issues and evidence [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04, (10): 301-326.
- [6] NICHOLAS DEW ET AL. Dispersed knowledge and an entrepreneurial theory of the firm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4, (19): 659-679.
- [7] JONATHAN J ECKHARDT, SCOTT A SHANE. Opportunities and entrepreneurship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3, 29(3): 333-349.
- [8] HARVEY S ROSEN. The future of entrepreneurial finance [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1998, 22: 1105-1107.
- [9] 张军. 话说企业家精神、金融制度与制度创新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 [10] 梁洪学. 对企业家内涵的批评性分析 [J]. 经济学动态, 2004, (7): 87-91.
- [11] 史晋川, 等. 中小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发展研究——以浙江温州、台州地区为例 [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3.
- [12] 袁纯清. 金融共生理论与城市商业银行改革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13] 连建辉. 融资制度与企业家筛选机制 [J]. 改革, 2002, (3): 18-24.
- [14] 鲁波. 金融发展与企业家创业决策 [J]. 商业研究, 2003, (23): 45-46.
- [15] 李茂生. 合格的企业家一定要善于利用资本市场 [J]. 新东方, 2004, (1): 4-11.
- [16] 庄子银. 南方模仿、企业家精神和长期增长 [J]. 经济研究, 2003, (1): 62-70.
- [17] 汪丁丁. 螳螂自语 [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
- [18] 陈建军. 产业区域转移与东扩西进战略——理论和实证分析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